

杨适文集

杨适 著

①



 人民出版社

杨适文集

杨适
著

1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适文集/杨 适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01-017320-7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278 号

杨适文集

YANGSHI WENJI

杨 适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125

字数:2755 千字

ISBN 978-7-01-017320-7 定价:470.00 元(全五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杨适先生是我的老师。自1978年至今,无论是大学读书还是后来当教师和独立工作,我一直都没有中断跟随先生学习和做研究。2012年12月,时值先生八十华诞,由我们几个学生辈的动议,对先生的著述进行整理,结集出版《杨适文集》。这个动议得到人民出版社的支持,相关工作就由我牵头做起来。这期间,先后参与工作的有:王晓兴、张春田、游斌、陈文庆、张文举、陈河晋。还有年轻的李思仪女士,为文本扫描和整理做了大量繁复的工作,并为第四卷《古希腊哲学探本》制作了精美的地图,这是应该特殊表示感谢的。

文集共分五卷,一一四卷是专著,第五卷是论文、译文集。专著的顺序大体根据初版的时间,但考虑到各卷的均衡,对卷次适当做了调整。全部论文均按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译文是先生为“猫头鹰文库”翻译的休谟的散文,共有11篇,收在《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书中,虽然分量不大,但是先生的认真和呕心之作,这次一并放在文集的第五卷,以为压轴。

收入文集的专著和论文、译文,除对个别文字进行订正和统一引文注释外,一律按初版和发表时的原样付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集整理成电子文稿后,先生不顾八十以上的高龄,坚持对全

部文稿亲自进行校订。这种严谨、严格和高度负责的学术态度,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杨适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先驱,他对马克思《手稿》以及晚期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是中国理论界重新认识马克思的重要成果。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一书,已经成为经典。

杨适先生是独树一帜的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他的《哲学的童年》一书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他的《古希腊哲学探本》是中国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力作。

杨适先生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中西人论的冲突》,以及他晚年倡导的原创文化研究,均有发人之未发的创见。

杨适先生的著述生涯跨越30余年,大体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是这个时代中国学术和思想史的一个侧影。我们将先生的著述结集出版,是对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也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积累一份有价值的学术资源。

2012年,王晓兴和我为科学出版社《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写有介绍先生生平与学术成就的专文,放在卷首,或有助于对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

易志刚

2015年6月15日于望京寓所

生平与学术成就

易志刚 王晓兴

1932年12月7日(农历壬申年十一月初十),杨适出生在安徽当涂县一个诗书家庭。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师范毕业后做了国民政府的基层官员。杨适2岁丧母,1937年南京沦陷后,父亲携继母及其子女和幼年的他逃难大后方,其童年可谓命运多舛。八年抗战期间,随父任职变迁辗转于湘赣桂渝各地,除了从父学习中国古典诗书外,断断续续完成了小学和初中学业。胜利后回到家乡,考入南京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读高中。这个时期,杨适开始接触来自解放区的书籍,思想和情感上倾向共产党。他和几位志气相投的同学一道创办壁报《呐喊》,积极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是学校里思想活跃的分子。同情工农,憎恶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苦难,向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基本倾向,也是他们选择共产党和唾弃国民党的根本原因。在经历了1947年“5·20”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之后,杨适和壁报《呐喊》的成员先后都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底,渡江战役前夕,杨适由组织安排撤离南京,在皖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独立支队。随部队重返南京后,一度为军管会工作人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杨适再次参军。因赴朝参战未果,在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和后勤干校先后担任文化教员、宣传

助理员和中级班理论教员。1956年,入南京军事学院理论教员培训班学习半年。这期间的教学生涯,使杨适得以较为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开始涉猎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1957年,怀着进一步深造的愿望,杨适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入学1年后,因北大公共理论课教师队伍亟需充实,杨适被抽调为教员,遂留北大哲学系任教,直至离休。

在北大,杨适和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共和国自“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一个理想的新中国与30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反差,及其所造成的困惑和苦恼,是中国知识界开始全面反思的根本原因。这种反思是从重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的。杨适也不例外。

1980年,杨适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论文《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根据问题》,提出否定之否定不仅是黑格尔辩证法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成果,是辩证法的最高发展。在当时,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学术争论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而是关涉到如何正确理解或重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因为,抓住否定之否定也就抓住了发展和自我发展,也就抓住了人和人的自我创造,也就抓住了人的自由。杨适写道:“建立在劳动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本性基础上的人类自我创造与发展,为理解人和自然之间、人之间、人的主体活动和这种活动所创造的对象之间、人的主观思维和外部客观存在之间、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性和人类取得自由之间的全部辩证关系和发展运动,提供了钥匙。”^①重新肯定人、人的自我创造,特别是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成果。对于杨适

^① 杨适:《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根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本人而言,这篇论文则可以看作是随后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年)的一个要点和先声。

《述评》一书的篇幅并不大,12万字,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但却对于理解马克思《手稿》的几乎所有理论要点和难点都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阐述,因此很快就引起学术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王易的书评《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马克思著作》,认为:“《述评》的作者之所以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研究《手稿》,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力求比较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本人在《手稿》中就是运用这个方法来解答历史之谜,攀上理论高峰的。”^①1983年,《哲学研究》第6期发表史敏的评论文章《对马克思哲学诞生地的探索》,认为:“《述评》对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科学的哲学创造’的真谛,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从而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住《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起源地和秘密’这个关键所在。”^②

对于这部虽然篇幅不大但却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力作,杨适自己在10多年后是这样评说的:“它虽是献给读者的,但首先还是为自己搞清问题而作的一番研究。因为在以前我也念过不少关于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书,却在收获之余总还有不少疑点和隔阂,觉得不够透彻。《手稿》的研究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突破口,不仅使我感到马克思讲道理亲切和深刻,而且开始了一种可以进行内心深处的对话。”^③之所以“是一个突破口”,是因为通过《手稿》的研究,杨适不仅获得了对马克思的全新认识和理解,而且也找到了指导自己研究和求索的理论和方法。关于

① 王易:《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马克思著作》,《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② 史敏:《对马克思哲学诞生地的探索》,《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

③ 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这个理论和方法,杨适做了这样的概括:

“人的真正现实的自我创造应当是这样的:人必须在实际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统统发挥出来,使之变成实际的对象性的现实(例如大工业等等),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人要全部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潜力,这绝不是个人的个别行为,它必定是全部人类的全部历史活动;并且必定是这全部历史活动的对象化,即成为客观对象性的成果才行。所以人的自我创造,就必须把人自己的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要把人自己的力量当作客观存在的对象来对待,也就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方面当作客体去对待,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就包含着异化并且必然会产生异化。”“对象化不等于异化,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又必然形成着异化。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为了取得生产力和人类全部能力的发展,人曾不得不把人类自己的主体力量仅仅当作一个外在的对象去对待,去使用,如同使用一个物、一个牲畜那样,如同对待一个商品那样,这就是奴役制,就是异化。人必须通过这种从总体上说来是自我异化的行为(具体地说,则是一部分人同另一部分人的异化、分裂与对立)来发展和创造人类自己,这乃是历史的必然性。”^①

这是对马克思的诠释,也是杨适自己的历史观和哲学。但是,拿这个新的历史观和哲学来面对中国的现实,杨适却感到依然不能解决心中的困惑。20多年后,杨适给自己做了这样的总结:“追究原因,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我还没有从源头上知道哲学究竟是什么;一是我对中国自身的文化和智慧还没有真切的重新认识。前者是我的工作的本分,后者是我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的本分。这两方面我都存在很大差距,而这两种缺陷又是相互起作用的。

① 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从此我大力转向对希腊哲学的研究,同时也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下了些功夫。”^①

希腊哲学,是杨适下力最多的学术领域,先后出版有《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伊壁鸠鲁》(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6)、《爱比克泰德》(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2000)和《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等专著,这使他成为独树一帜的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

1987年出版的《哲学的童年》,是一项没有完成的研究计划的第一编,这项研究计划就是书的副标题——“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作为第一编,《童年》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一如它的编名所示:“西方哲学在古希腊从产生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关于哲学的产生问题,杨适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得以产生的三个条件“惊异”、“闲暇”和“自由”入手。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谓三个条件,其实只有第三个条件也即“自由”才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自由思考对于哲学是件生命攸关的事情”。把自由视为希腊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着眼于对希腊人现实具体的自由进行分析批判,是贯穿《童年》全书的一条主线,也是《童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杨适写道:“希腊人的现实的自由是矛盾过程,它的第一个动作是分离,使新的因素从旧胞胎里分离,使个人同氏族分离,使私有财产从公社公有制分离,从而使新东西得到自由和解放。它的另一个动作则是结合,使分离开来的各种新因素按照新方式重新组合起来,使旧事物经过否定和瓦解后那些仍然有用有益的成分被吸取于自身作为有机的环节。这种现实的分离和结合的‘自由’,在哲学上就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析和综合的思维

① 杨适:《哲学之为哲学的原义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

自由运动;当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事物分别考察以后,重新加以联结也就成为必要的事情。于是思维逐渐深化细致起来,原始的浑然不分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就为不断分离和组合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所代替。人类思维史上的重大变革就这样开始了。”^①

《童年》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把希腊哲学的产生和形成看作“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过程”。杨适把希腊哲学的产生和形成划分为两个阶段:原始素朴哲学和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原始素朴哲学从米利都学派的本原是感性事物及其质,到毕达哥拉斯的本原是数或量,再到赫拉克利特的本原是对立统一的火,呈现为两个发展圆圈的交错完成。第一个圆圈是“质——量——度”,第二个圆圈是“直接性的规定——间接性的规定——直接性规定和间接性规定的统一”。在这两个圆圈中,第二个圆圈是主圆圈,因为第一个圆圈作为直接性的规定被纳入第二个圆圈,从而达到质和本质的统一,并在终点上同时完成两个圆圈的发展。这是由赫拉克利特完成的。赫拉克利特继承了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的成果,同时又扬弃了他们,因此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至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也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有内在生命运动的发展过程,并且也是一个圆圈。这个圆圈无论在基础和水平上都高出原始素朴哲学的那个圆圈,在深度、规模上也比前一个圆圈要大得多:它从巴门尼德的形式思维方式及其本体学说‘存在’论出发,最初是相当空洞的;因此必需再次从现象获得内容,走向现象,然后又从现象返回本质,取得具体的内容和相应的形式;最后,在普遍的形式规定中把本质和现象,原因和事实统一起来。这还是一个否定性的辩证运动过程,即否定之否定,使形式思维方式及其

^① 杨适:《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认识的最终成果——本体学说达到了自己的建立形成。”^①

《童年》关于希腊哲学圆圈式发展的见解,未必能为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所普遍接受,但它紧紧抓住自由,从希腊人现实自由的矛盾过程中发掘和发现希腊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却为中国人了解、学习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研究和思考,开启一代新风,因此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尊重。1990年,范明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书评《喜读杨适〈哲学的童年〉》,认为《童年》“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上别具一格,并在经过分析和论证而得出的理论观点上多有创建”,尤其在探索哲学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线索方面,《童年》“苦心孤诣地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见解,并用于具体分析,从而揭示出希腊哲学发展的一般线索”。^②《童年》以其富有创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见解,成为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一部经典之作。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童年》列入“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第一辑再版发行。

和《童年》相比,2003年出版的《古希腊哲学探本》是一部相对更完整的研究希腊哲学的专著,它包括三个部分:原始素朴哲学、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和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但是,《探本》不是《童年》的扩充或增补版,而是包含了新的研究成果和对希腊哲学新的认识和理解的一部新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探本》的写作是在杨适对“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下了些功夫”之后,尤其是在他提出、倡导并力行原创文化研究之际,因此打上了他在这些方面求索的印记。

杨适对中西文化比较问题的关注,始于《童年》的写作之后。

① 杨适:《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6页。

② 范明生:《喜读杨适〈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1988年,杨适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论文《中国传统人论的历史地位问题(论纲)》,从探求今天的中国人所需要的自我意识或新的人论出发,对中西传统人论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中国传统人论所讲的“人”是指由“人伦”形成的整体,重视“天人合一”而实际以“人伦”为核心;西方传统人论则重视人与自然的区别、灵魂与肉体的区别,在区别之后再力求达到新的统一。文章采取了论纲的形式,共25条,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中西人论比较研究的一份提纲。1991年,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冲突》将中国传统的“人伦”与西方的“自由”对举,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揭示出中国传统的“人伦”实质是“宗法人伦”,是一种异化的人伦;西方的“自由”,无论是古代的奴隶制还是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质都是不同形式的奴役制度,因此是一种异化的自由。如何在扬弃异化和保留人类原始的人伦和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整体与所有个人的自由主体性的有机统一,是未来新人论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冲突》一书中,杨适明确提出一种观点:文化的中心在人,文化理论的中心在人论,而人和人论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杨适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求索的基本思路:首先要关注和研究创造文化的人本身,那些最初创造其文化的民族实际生活和历史是怎样的,然后就要着重研究他们是如何自觉其为人的,如何自觉地创造出关于做人 and 生活的各种文化制度和学说来的。前者是具体的历史分析,后者的核心就是人在精神上的自觉或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也即人论,奠定了一种文化的基础,规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这一基本思路,成为他日后提出并倡导的原创文化研究的滥觞。

所谓“原创文化”,在杨适是指“以往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几

个在精神智慧上影响最重大深远的形态由以起源的创造原型”。关于原创文化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原创与传统的关系以及原创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目的等问题,杨适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1)原创文化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大体上说,原创文化包括了西方文化由以起源的希腊文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以起源的犹太文化、佛教由以起源的印度文化以及东亚文明由以起源的中国文化。这些原创文化表现为古代圣贤、先知、哲人的言行以及记述这些言行而形成的经典。它们对后世一直起着普遍的教化作用,从而广为流传,受到各有关民族和地区的广大人民的普遍尊崇。这种教化作用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些原创文化中都包含着某些可以称作智慧的东西,这是一些在文化中属于精神层次,而在精神文化中又属于高级层次的东西,其核心乃是人类最初的自我意识觉醒以及与之相关的天道意识。

(2)原创与传统的关系。原创文化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更是一个全然思想或精神的概念,它以一种与传统相对比的方式,显露了人类精神的本质。传统是从原创演化而来,因此传统才获得生命;但传统在发展原创的同时又使原创的精神智慧受到遮蔽或异化,并且它还总是掩盖这种异化。因此需要通过去蔽、返回原创,才能显明真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也是原创得以在历史上得到发展和保持的力量,传统和原创既对立也是统一的。通过寻求原创来重新审视传统,通过重新审视传统来再度发现原创的真实生命精义,从而为新时代重新发展人类的原创力提供可能的资源和思考。这是原创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立场。

(3)原创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目的。原创文化研究应当有

如下的两极性特点:用追根溯源的对于文化智慧最具学术性的(或书斋式的)研讨,为当代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更新的最现实的需要服务。杨适写道:“它的使命正如中国先贤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其资源则将大为扩展和深化。我们的目的并非只是对各种原创的文化智慧进行追溯和赞颂,而是要为现在生活在阳光普照下的所有人寻求天道和做人的本真;并以真诚的兄弟和朋友之心,进行几种原创文化之间的比较和对话。”^①

从中西比较的立场,尤其从原创文化研究的视野看,希腊哲学是人类最可珍贵的几种原创智慧之一。如何认识希腊原创智慧不同于其他几种原创智慧的特点及其特殊意义,就成为杨适写作《探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和核心问题。

《探本》写有长篇《绪论》,专门讨论希腊哲学的中心论题:ὄν (being,通译为“存在”)。通过检讨希腊哲学研究的历史,杨适把问题归结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翻译希腊哲学和希腊语言中的ὄν,才有助于我们认清希腊哲学的原义和真正秘密?由于语言的差异,ὄν的翻译困扰了几代研究希腊哲学的中国学者。在杨适看来,ὄν的中文翻译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其原因就在于对ὄν这个希腊哲学的中心论题缺乏真切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也未能对与之相关的希腊语词和汉语词做仔细深入的考察。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杨适不惜再次学习希腊文,进而探求与之同源、同属印欧语系的梵文语词原义,以及汉语言文字中相关词语的原义及其变迁,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绪论》里,他通过对梵、希腊和汉语词的探源研究和语义辨析,揭示出:(1)希腊古典时期哲学(所谓

^① 杨适:《关于原创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中心论题借以表现的 $\delta\upsilon\nu$, 其实和原始素朴哲学借以表示的中心词 $\phi\acute{\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自然) 原是一对可以互注互换的词根, 两者均为表示存在的关键词; (2) 相比而言, 表示动态的 $\phi\acute{\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即“自然”一词, 无论从本义和哲学思想发展史上说, 其地位都更为根本和原初。基于这种认识, 对如何用汉语词来表达和翻译希腊语词 $\delta\upsilon\nu$, 杨适做了许多细密的考察, 也发表了关于 $\delta\upsilon\nu$ 的中文翻译的重要见解。但杨适认为, 不能孤立地考察 $\delta\upsilon\nu$ 的含义, 也不能用对 $\delta\upsilon\nu$ 的日常语义考察代替对 $\delta\upsilon\nu$ 的哲学含义的考察。而所谓对 $\delta\upsilon\nu$ 的哲学含义的考察, 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考察 $\delta\upsilon\nu$ 在全部希腊哲学中的“位置”, 考察它作为希腊哲学中心论题的地位和作用。他说: “ $\delta\upsilon\nu$ 的哲学意义只有在同希腊哲学的其他各个重要概念的联系贯通之中, 在希腊哲学全部发展即探索中, 才能展示它本身的起源、萌芽、发展及其不断的论证和修正”。^① 通过对 $\delta\upsilon\nu$ 的考察, 杨适力求站在一种新的视野和高度, 从整体上把握希腊哲学及其发展和成就:

(1) 作为希腊哲学主要支柱的三个概念: $\phi\acute{\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自然)、 $\delta\upsilon\nu$ (存在) 和“神”。在希腊哲学中, 最先出现的主要哲学概念不是 $\delta\upsilon\nu$ (存在), 而是 $\phi\acute{\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自然) 及其“本原”($\acute{\alpha}\rho\chi\eta$, principle)。杨适认为, 希腊哲学不是从 $\delta\upsilon\nu$ 而是从 $\phi\acute{\upsilon}\sigma\iota\varsigma$ 开始, 是有深刻原因的。因为, 生生不已的“自然”不仅是哲学最深层的全面的考察对象, 也是后来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的“存在论”或“本体论”(ontology) 的深层基础。这表明, 希腊哲学决不是唯“本体论”的。希腊哲学从“自然学”开端, 通过“数(哲)学”过渡到古典时代的“存在论”或“本体论”, 最后又在晚期希腊哲学中返回以“自然(哲)

①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03 页。

学”为中心的形态。在这整个过程中,希腊哲学始终同神话和宗教的“神”观念密切关联。希腊哲学从神话和宗教而来又始终同它相关,一方面从中吸取智慧,另一方面又总是用新的哲学本原本体观念对“神”做新的诠释。φύσις(自然)、ὄν(存在)和“神”是支撑希腊哲学大厦的主要支柱,它们的互相联系和区别,互相作用、转化和互相诠释,构成了希腊哲学发展的主线。

(2)从 φύσις-ἀρχή(自然—本原)转换为 ὄν-οὐσία(存在—本体)的意义:“求真”的严格逻辑思维方式的形成。从巴门尼德把 ὄν 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来之后,希腊哲学的研究中心就从 φύσις-ἀρχή(自然—本原)转换为 ὄν-οὐσία(存在—本体)。这是希腊哲学和人类思维发展史上的一大转变。这个转变的实质是:希腊思想从生动感性自然的水平向着严格确定的理性逻辑水平,实现了一个伟大的飞跃。它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各个哲学家相继提出的学说中的那些结论,而主要在于原创了、确立了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严密的“求真”思维方法。直到亚里士多德把第一哲学定义为研究“ὄν 本身”(ὄν 之所以为 ὄν)即“ὄν-οὐσία”(本体)的学说,系统阐述了逻辑思维的原理和演绎法、归纳法和辩证法的推理学说,希腊哲学的“求真”精神和逻辑方法就达到了高峰和基本完成。

(3)希腊哲学“求真”含义的更高层次是“求真善”。在如何理解和认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以及希腊哲学的最高成就的问题上,杨适不囿于中外研究希腊哲学的成见,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代表希腊哲学的最高成就,而苏格拉底和爱比克泰德才是“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伟大的导师”。在他看来,苏格拉底是“古典时期希腊哲学家中间最有原创性的中心人物或灵魂”。苏格拉底“把希腊哲学引向了认识人自身”,“认为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探求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把求真和求善统一